

新马地区华侨华人文化传承现状调查*

马占杰 林春培 李义斌**

摘要: 从文化层面看,多元共生策略是指各民族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努力保持文化认同与文化宽容的动态平衡,力争实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存格局。长期以来,新马地区华人积极践行这一策略,将“各美其美”作为核心理念和目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作为共生载体,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共生环境,努力培养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并采取斗争和沟通的方式,为中华文化的本土化传播争取权利,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未来,新马地区华人要善于吸纳和运用新思想、新方法,克服“重传统、轻当代”倾向,并要重视与国内官方和民间团体的合作,挖掘中华文化传播的经济价值,以扩大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共生载体的影响力,更好地从文化交流角度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大局。

关键词: 新马地区华人 中华文化 多元共生 海外传播

* 本文是华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海外华商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及风险规避研究”(批准号:14SKGC-QT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马占杰,管理学博士,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华侨大学华商研究院成员,研究方向为华商发展与企业管理。林春培,管理学博士,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华侨大学华商研究院成员,研究方向为华商发展与企业管理。李义斌,管理学博士,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华侨大学华商研究院成员,研究方向为华商发展与企业管理。



一 引言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大会上强调：“我们要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也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事实上，从20世纪60、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已成为多个国家民族政策的主流。运用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上，共生理念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视角之一。因此，乐黛云教授指出，“中华文化最大的利益就是与世界文化多元共生，参与到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来”^①。

共生的概念源自生物学，原指“不同种属的生物生活在一起，双方都可以获得利益”，现已成为解决社会管理认知和行为边界跨越的桥梁^②。从文化层面看，“多元共生”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多种异质文化不是单一的开放或消亡，而是在日益强化的沟通交流过程中，文化认同与文化宽容保持动态平衡，最终形成相互尊重、相互承认、相互促进的平等共存文化格局^③。其中，“多元”是指文化的多样性，“共生”是指文化的互生性和互进性。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多元共生是多元文化中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④。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就是“多元共生”策略的倡导者，他认为，虽然每种文化都具有扩张性生存本能，但文化之间有“可

① 乐黛云：《关于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几点思考》，北京大学文史大讲堂（第15讲），2012年5月31日。

② Sarah. K, Jonathan. M, Ruth S. C, “Symbiotic Practices Spanning: Bridging the Cognitive and Political Divide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60 (4): 1387-1414.

③ 易佑斌：《多元共生：建构中的东亚共同体理念》，《岱宗学刊》2005年第4期，第7~10页。

④ 伍柳氏：《和而不同 多元共生——略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发展策略抉择》，《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81~183页。



理解性”与“可对话性”，各种文化与思想在保持异质性的同时，可以在相互凝视与对话中碰撞出多样性、启迪性的火花，对话的过程应当“面对面，使用各自的语言，保持文化的相异性，跨越有间距的立场，追寻理解彼此”^①。

在实践中，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就是中外文化形成共生机制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在新马地区传播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以林连玉、陈嘉庚、李光前等为代表的华侨华人，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用“多元共生”的理念和策略处理中华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关系，依托所在国本土的政治、人文、社会等资源，在斗争与妥协中传播中华文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初步形成了丰富生动的多元共生文化格局：一方面，所在国的文化与传统已经对华侨华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重视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海外很多国家和地区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在海外也逐步受到青睐。

二 文化传播的多元共生策略：核心内容与实现途径

（一）多元共生策略的核心内容

根据郑一省等的观点，共生并非指各民族原生态的文化并存，还具有竞争和冲突的动态开放性特征，文化交流过程中参与方只有在相互尊重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共生单元才能更好地寻求自身定位，并扩大各自的共享领域^②。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化在与其他文化交流过程中，费孝通先生认为，我们要以发展、演进的观点去审视民族文化，不是单纯要“复归”，也不主张“全盘他化”，即“各美其

① 吴攸：《“多元共生”文化理想下的中西思想对话——以弗朗索瓦·于连的汉学研究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第197~206页。

② 郑一省、叶英：《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共生生态势初探》，《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第20~25页。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①。

文化传播行为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行为体行动的基础是共有的期望^②，因而文化传播需要兼顾传播主体和客体两个端点。而文化共生的本质是通过传播主体和客体的协同与合作，建立以多元互补与彼此平等为基础的互惠共存、全面和谐的关系，即满足“为了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的共有期望。另外，文化具有“本土性”与“民族性”的特质，它与特定的民族历史记忆和社会共同经验息息相关^③。因此，文化的共生状态是指，“传播主体在相互兼容、相互吸收过程中提升各民族文化的品位，在发展中保留各民族文化特色，在区域范围内呈现出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和谐统一的并进状态，即互相尊重彼此的价值观，了解对方文化的禁忌与喜好，如宗教敏感区、人文风俗等”^④。

根据费孝通、丁龙召、易佑斌、伍柳氏、萨拉（Sarah. K）等学者的界定，我们认为文化海外传播的多元共生策略是“文化多元主义”与“和而不同”思想的有机结合，“美美与共”是该策略的核心目标。这就要求民族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传播主体要突出“自己之美”，利用本民族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拓宽文化领域；另一方面，传播主体要通过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欣赏学习其他文化，相互借鉴、吸收和融合，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体系，并找到相应的位置与坐标^⑤。传播主体既在民族内部反对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又在民族之间反对单极的文化霸权主义^⑥，主动“和”入世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积极成分，将与不同

①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② [美]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79页。

③ 吴旻：《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例外”与文化复兴》，《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④ 丁龙召：《认识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新视角：各民族共生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

⑤ 方光华、曹振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思潮论析》，《人文杂志》2011年第9期。

⑥ 伍柳氏：《和而不同 多元共生——略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发展策略抉择》，《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81~183页。

文化对话产生的外生性力量转化为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内生性动力。根据多元共生策略的内涵，其核心内容如下。

第一，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是多元共生策略的根基。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历史证明，文化具有民族根植性，唯有文化的个性化发展，才会呈现一个真实的、富有成果的全球化历史进程^①，多元共生策略要求传播主体对中华文化有充分的自信，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在各种异质文化面前要强调突出“自己之美”^②。

第二，“美人之美”是多元共生环境改善的重要保证。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筱筠研究员的观点，多元共生作为一种文化格局，其内部各种次文化体系之间通过有序竞争产生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和助推力。费孝通先生认为，“美人之美”从主张尊重文化多元性并从差异性的角度，旨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分离主义的认知缺陷，能够降低其他民族的抵触心理，有助于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当地文化体系中^③。

第三，语言文字、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是实现多元共生策略的主要载体。根据符号学的理论，文化传播实质上是符号“编码—传输—接收—解码”的过程，文化信息的存储和传播是通过文字、语言和习俗等实现的。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既是凝聚侨心、弘扬文化的重要纽带，也是他们向住在国展示祖（籍）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共生载体。

第四，斗争与沟通是多元共生策略的必要手段。在跨文化交际的场域中，不同文化地位的不对等与不平衡性日益凸显，“弱势文化”的身份与

① 邹广文：《全球化进程中的哲学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② 吴旻：《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例外”与文化复兴》，《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③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第197页。



传统受到冲击便成为常态^①。共生理论认为，面对文化冲突，除了斗争，还必须求得与他人、其他群体的妥协合作^②，即少数族裔在争取本族群权益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与其他族群的交流与沟通^③。多元共生与和谐文化相互渗透是多样性文化交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异质文化相互间的沟通与交流、渗透与排斥、融合与重构，共同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文化图谱^④。

（二）多元共生策略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实现途径

海外华侨华人利用多元共生策略促进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传播主体要努力培养文化自觉意识，依据“美出于和”这一中华哲学美学的基本原理，发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的优势。通过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充分互动，一方面利用“求同”策略强化共识并促进融合，另一方面利用“存异”展现各具魅力的独特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国外受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又不能以迎合和顺从国外受众作为传播的出发点。

1. 培养传播主体，提升文化自觉意识

研究表明，“中国故事”讲述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水平，共生主体的主观努力是共生策略实现的主要途径^⑤。在海外，中华文化属于“弱势文化”，它蕴含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传统受当地主流文化冲击便成

① Wang Ning, "Identity Seeking and Constructing Chinese Critical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2011, 30 (3): 57.

② 丁龙召：《认识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新视角：各民族共生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

③ 胡春艳：《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华人权益争取：以政治社会学为视角》，《八桂侨刊》2014年第4期，第13~17页。

④ 伍柳氏：《和而不同 多元共生——略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发展策略抉择》，《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81~183页。

⑤ Sonja. O, Victor. N, Hankan. JH, "Risk Aversion and Guanxi Activities: A Behavioral Analysis of CEOs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60 (4): 1504 - 1530.



为常态^①。根据文化的认同保护认知机制，非主流个体倾向于使自己的观点、态度、信仰与其参照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成员保持一致^②。因此，要提升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效率，必须有一大批胸怀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责任担当的“灵魂型”传播主体，他们既有中华文明修养，也有对国外文明的把握；既有满腔的热情投入，还会站在科学角度对传播规律进行把握。培养其他传播主体以包容的心态和宽容的情怀进行跨文化传播，消除对外传播的自卑心态和自负心态。

2. 改善华侨华人的自身形象，营造多元共生环境

实践表明，广大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形象会严重影响中华文化的传播环境。因此，广大华侨华人可以通过下列途径改善形象以营造共生环境：第一，按照“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的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睦邻亲善”，平等对待当地居民，特别是下层原住民，尊重他们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第二，为得到当地主流社会的关注与支持，华侨要积极消除铺张浪费、奢侈攀比行为，并积极开展慈善事业和从事社会活动；第三，充分利用华人媒体在塑造华人形象上的积极作用，通过介绍祖（籍）国的发展和华人的典型事迹，分享海外华人适应当地社会的经验和心路历程等，帮助华人树立积极的形象，让当地人认知、了解和认同华人和中华文化。

3. 利用共生载体，与海外受众双向沟通

对于其他国家民众来说，中国是“陌生”的国度，他们对中华文化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甚至存在误解和排斥心理^③。而文化信息的存储和传递是通过文字、语言和习俗实现的。因此，华侨华人可以独特的中华文化为共生载体，从语言、文字、历法、哲学、文学、医学、建筑、饮食、音乐、绘

① Wang Ning, "Identity Seeking and Constructing Chinese Critical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2011, 30 (3): 57.

② Cohen. G. L., "Party Over Policy: The Dominating Impact of Group Influence on Political Belief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 808-822.

③ 曹波：《中华文化传播的三个意识维度》，人民论坛网，2017年1月9日。



画、戏曲等方面向住在国展示中国。例如，传统书画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古筝唢呐、曲艺杂技等传统项目丰富多彩，这是实现文化多元共生策略的主要途径之一^①。例如，在阿根廷华侨华人的努力下，“欢乐春节”庙会已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2005年起纳入该市年度系列庆典名录，每年都会吸引数十万当地民众参与。

4. 从“播”到“生”，实现互通共荣

华侨华人在海外构建中华文化共生体系，由“播”到“生”是中华文化实现从“走出去”到“融进去”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多元共生策略的实现必须依靠“播”，包括官方机构、民间团体和个体等传播主体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华侨华人作为民间使者，积极与当地民众和政府进行沟通，并采用人际沟通的方式，以不卑不亢的姿态展示中国面貌，真诚地传播中华文化，用直观的方式提高中华文化在当地的曝光率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多元共生策略也必须突出“生”，可以用“加减法”思维，在多元化的社会中适应“文化冲突”，对自身文化元素进行包装和整合，学习和借鉴当地文化，在相异文化的交流整合和互动中再造共有文化，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生根发芽。

三 新马地区多元文化的构成与特征

（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区域关联性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东南亚相邻的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相邻、相似的发展历史、大体相同的民族和宗教构成，尤其是两国在1963~1965年同属于马来亚联邦，因此在政治、文化和历史的相关研究中，经常将两个国家统称为“新马地区”。在近代，西方国家对新马地区有很长的殖民控制历史，这

^① 伍柳氏：《和而不同 多元共生——略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发展策略抉择》，《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81~183页。



些不同的殖民国家把它们的制度、文化和殖民经济体系注入马来半岛。

1. 发展历史的相似性

马来西亚（1965年独立前为马来亚）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早期，印度文明起支配和主导作用，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开始影响该国。公元初期，马来半岛建立了羯荼国、狼牙修、古柔佛等古国。从7世纪到14世纪，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大部分地区开始受到三佛齐的影响。16世纪末以后，由于在马来西亚发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欧洲殖民势力开始扩张。出于资源开发的需要，到了18世纪，阿拉伯人、印度人、华人移民开始涌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直到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于1957年宣告马来亚联合邦独立，1963年英属的新加坡、沙巴州、砂拉越州加入马来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退出联邦独立。因此，目前的马来西亚由马来半岛（简称“西马”）、砂拉越和沙巴（称为“东马”）构成。

新加坡的发展历史与马来西亚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在早期，8世纪的新加坡地区属室利佛逝，14世纪始属于拜里米苏拉建立的马六甲苏丹王朝，18~19世纪时也归属柔佛王国。而从1819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开始，英国殖民势力开始在新加坡扩张，到1824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样被日本侵占。到了1963年，新加坡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加入马来亚联邦，但由于新加坡华人数量过大，而马来亚一直强调马来人的主导地位，使得双方矛盾不断升级，于是在1965年8月9日独立成为新加坡共和国。

2. 人口与民族结构的相似性

由于历史发展和地理位置因素，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多民族的国家，马来人、印度人、华人都是主要族群之一。其中，华人迁居新马地区数百年，其祖居地大多位于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最多的是闽南人（约40%），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莆仙人（莆田人）、海南人，另外还有峇峇、娘惹等。

在马来西亚，“原住民族”包括尼克里多族、西诺伊族、雅贡族等，而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则是主要族群，占总人口的90%以上。2018年数据显示，



马来西亚总人口 3238.5 万，土著（马来人及原住民）共 2007.19 万（61.98%）、华人共 668.55 万（20.64%）、印度裔共 201.04 万（6.21%）。在砂拉越，非马来土著占一半以上人口，在沙巴则已经超过三分之二^①。

而新加坡人主要是由欧亚地区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从 1819 年开始，英国殖民当局在新加坡长时间实行自由放任和自由移民的政策，形成了以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洲人为主的多种族社会。截至 2018 年 6 月，新加坡总人口 563.9 万，其中包括华族（74.2%）、马来族（13.3%）、印度裔（9.1%）和欧亚裔（3.4%）等^②。

（二）新马地区的多元文化版图

从地理位置来看，新马地区位于东西文化的重要通道上，即通过马六甲海峡可直达印度洋，通过南中国海可直达太平洋。同时，新马地区属于“第三汉文化圈”，融合了中华文化中道家、法家诸学及儒学影响^③，还处于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这两个亚洲最大的文明古国之间，使其成为东西方文化冲击、交汇和融合的桥头堡。另外，早期离乡背井到新加坡再创家园的移民将各自的传统文化带入新马地区。上述因素铸就了新马地区“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流传千国语、容纳万种教”的多元文化基础，本土文化、移民文化、殖民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融合构成了新马地区多元文化的显著特征。

1.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

英国殖民统治（1819～1959）给新加坡留下的遗产是新加坡社会的多元性。1965 年新加坡退出马来亚联邦宣布独立后，在国内政治动荡、种族矛盾加深的严峻形势下，新加坡政府选择多元而非专制的统一政策，采用了

① 数据来源：《马来西亚人口：年龄、性别、族群分类（2018）》，马来西亚统计局，2018。

② 数据来源：《2018 年新加坡人口简报》。

③ 胡礼忠、汪伟民：《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暨中外关系史学会 2004 年年会述评》，《国际观察》2004 年第 2 期，第 74～80 页。

“四 M 原则”：多元民族（Multiracialism）、多元语言（Multilanguage）、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和多元宗教（Multireligion）原则，使得文化多元性得以延续。

在宗教方面，新加坡被称为“世界宗教大观园”，各类宗教的信奉者占全国人口的 80% 以上，他们中除了大量信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信徒以外，奢那教、锡克教、犹太教、拜火教、天理教和巴亥教等也有数量不少的信奉者。主要宗教中，新加坡佛教和道教是全国第一和第二大宗教，占总人口的 40% 以上，境内寺庙林立，四马路观音堂也是新加坡香火最鼎盛的庙宇之一。基督教徒（新教和天主教）占总人口的 18%，伊斯兰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15%。

在语言方面，新加坡是语言结构最复杂的国家之一。独立之后的新加坡有华文、英文、马来文、泰米尔文四种不同“源流”的学校，这四种语言并用，而且还有多种方言融合其中。从 1987 年开始，政府规定中小学以英语为第一语言。近年来，为适应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同时使广大华人华裔兼具中华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优势，新加坡政府开始逐渐认识到华文的重要价值，于是开始了一系列“华语推广运动”。1999 年，时任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国会发表政策声明：“母语使我们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使我们更具有平衡的、与英语世界相辅相成的世界观，所以华文教学，不只是听说读写的教学，更重要的是灌输华族文化与传统价值观。”

因此，新加坡不仅拥有亚洲的儒家文化、穆斯林文化、印度文化，而且还有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其他亚文化等世界主要文化，它们彼此交织融合，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共生文化现象。正如新加坡官方年鉴文化部分所描述的那样：“不同的民族汇集在一个空间很小的现代化国家里，赋予新加坡一个具有浓厚趣味的传统性兼现代性的文化……保存这多种文化传统，创造一个优良环境以追求艺术的至善。”

2.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

在马来西亚，阿拉伯文化、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共同存在，不同族群的文化习俗虽然各有不同，但每一种文化都得到充分体现，每一种



文化既保持原有的特色，又融进了新的内容。例如，华人主要认同中华文化，主要讲华语，穿华人服饰，重视孝道和家族血缘关系，基本没有饮食禁忌，信仰佛道教。而马来人讲马来语，信仰伊斯兰教，尊奉《古兰经》，有严格的饮食禁忌，过伊斯兰教教历的古尔邦节和开斋节等节日，实行教内通婚。

文化多元性可以从生活中的许多方面说明，其中一项主要的依据是种族人口比例。从人口地理分布来看，马来西亚的华人集中在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尤其是檳城、霹靂、雪兰莪、马六甲和柔佛。相比之下，在华人聚居地之外的华人，人数比例可能小得被其他族群淹没。譬如，在吉兰丹，当地华人在马来人为主的社区生活，触目所及都是马来人、马来文化、马来世界。而在东马的沙巴州，人口仅约 300 万，其中华人华侨仅占 10% 左右。在该地区，虽然华人数量不多，但中华文化很好地融合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中文随处可见，从各种招牌、广告牌到报纸杂志，中文几乎覆盖了沙巴洲的每一个角落。

(1) 马来文化

马来族是马来西亚的第一大族群，主要信仰伊斯兰教，具有阿拉伯文化的明显特征。他们使用马来语，尊崇苏丹，马来主权和马来人至上是其文化的最突出特征，在服饰、饮食、建筑等方面都含有印度文化的特征，其民间习俗和家庭制度也拥有穆斯林传统形式的部分特征。由于暹罗族是古代移居马来亚的暹罗人及其后裔，大多数人属于泰国的泰族，他们普遍信仰佛教，至今保持着传统佛教的出家习俗，而有泰族文化的古代形式到今天仍然存在，如用棕榈叶串成的浮雕和古代书籍、镶嵌图案的铜银器、驱鬼治病的巫术、祈求丰收的祭祀等。

(2) 印度文化

大量印度人因英国殖民统治而移民马来西亚，根据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不同特征，印度系民族又可细分为锡兰族、锡克族、泰米尔族和齐提族等民族，他们的生活和宗教活动密不可分。例如，凡在他们聚居的地方，他们都会集资修建一座印度教神庙，哪怕个人少买一块地皮或一幢房子，他们也要捐款兴建神庙，作为他们日常朝拜神灵和节日集会的神圣场

所，而且他们隆重庆祝大宝森节、屠妖节和踏火节等节日，其隆重的仪式和盛大的场面，都受到其他民族的高度关注。

(3) 华人文化

19世纪中叶，中国人大量迁徙南洋，在马来半岛各地形成了华人聚居的社区。他们把中华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把文化扎根在马来西亚，成为本土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华人人数众多，而且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对华人有较强的吸引力，逐渐形成了今天在马来西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华族，他们主要信仰中华文化中的儒、佛、道等。德教提倡“五教同宗”，把道教、佛教、儒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融合为一体，起到了联系乡谊、保持和传播中华文化、济危扶困等方面的作用。因此，当德教创始人李怀德在马来西亚建立第一个德教组织“紫新阁”后，德教在华族中拥有较大影响力。

(三) 新马地区多元文化的融合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一个族群的文化适应倾向主要取决于主流社会的政策与态度。虽然每种文化都是独立的文化系统，但在一定条件下各种文化系统之间可以实现融合。个体对群体的认同并不完全是由共享的文化与血缘等族群自身的特征所导致的原生情感^①，更是缘于群体间的互动行为而产生的社会与文化边界^②。华人对当地文化的适应未必一定导致同化，反而可能会产生混合型文化，既保留华人文化，又大量接受当地文化^③。因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正是在认知上打破了之前不同民族社会不互相往来的沟通状况，增强了民族之间的理解，促进了多元化文化的融合和民族关系的发展^④。

①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第307~308页。

② Fredrik Barth, “Introduction”, in Fredrik Barth (eds.),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Norway: Universitets forlaget, 1969, pp. 9-38.

③ 曹云华：《变异和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④ 蒋炳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和谐实现——基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观察》，《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8期，第137~140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狮身鱼尾”式文化就是新加坡以中国儒家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等的“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创造出来的。马华文化是中华文化传播到马来西亚本土后扎根在马来西亚并在马来西亚的客观和生活条件下经历调整与涵化历程之后发展起来的华族文化^①，被认为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它是马来西亚华裔公民为适应马来西亚的社会环境，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经过几代人长期的继承、扬弃、改造之后产生的宝贵精神成果^②。它由早期来自我国广东和福建的移民组成的华人社群，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自然互动过程中，相互调适、融合与吸纳而形成。

1. 马来西亚的文化融合

促进文化的融合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府努力的方向。1970年，马哈蒂尔在撰写的《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中提出了“马来西亚民族”的概念，他认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包容是马来西亚社会发展的关键，所谓“马来西亚民族”是指各民族还信奉自己的宗教信仰，各自的语言文化不改变，即华人在家中讲华语，马来人在家里仍然讲马来语，不同的只是大家要想到都是同一个国家的成员，要互相容忍和接纳，不要再严格分彼此。

作为马来西亚国民重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华人，在促进中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还在努力汲取当地主流文化以及当年殖民者遗留的西方文化等的精华，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使中华文化在新马地区具有多元融合的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吉兰丹的土生华人文化和马六甲的眷齐文化，它们是已被高度涵化的华人文化，虽然还保留着中华传统文化中对祖先的祭拜及对神灵的膜拜，以及中国人传统的婚丧仪式及节日庆典，但这两种文化在服饰、语言与饮食方面受泰人文化的影响，目前几乎都已经马来化。

在马来西亚，在城镇上可以看到肤色和服装各异的马来人、华人、印度

① 饶尚东：《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载《东南亚：文化冲突与整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9，第45~47页。

②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资料集》，2001，第251~252页。

人杂居相处，多元文化融合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巴基斯坦族与马来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两个民族来往密切，他们可以同往一个清真寺礼拜。例如，马来人在见面时的传统礼节是用双手握住对方的双手互相摩擦，然后将右手往心窝点一点。见到不熟悉的女士时，男士应该向女士点头或鞠躬行礼，并且主动以口头进行问候，而不可随便伸手要求女士握手。但现在西方文化中的见面握手礼节在马来西亚应用得最普遍，在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之间都可通用无阻^①。在民间信仰方面，有些华人也相信马来法术“贡头”，也会拜马来神“拿督公”，甚至对吸血人妖也能够津津乐道^②。

在民俗融合方面，马来族至今还保留着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类似的古俗，马来人的服饰与中国西南地区苗族的长裙和宽袖上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马来族的“弄迎舞”与中国西南地区苗族的“摇马郎”颇为相似，马来人染制纱笼花纹的传统蜡染方法，也早见于中国西南的仫佬族。在东马的沙巴洲，早期的卡达山人信仰万物有灵，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仪式，自从基督教进入卡达山人的生活以后，纪念仪式的音乐文化也融入了西方文化的因素。例如，在沙巴丰收节庆典现场看到的库林当安乐队，锣的数量已达到24面，可以任意演奏西方12平均律的半音关系，其节奏、风格带有西方摇滚的某些特征。

另外，马来西亚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在建筑物上也得到充分体现。各民族建筑物的分布鳞次栉比，庄严肃穆的马来人清真寺、雕梁画栋的华人庙堂会馆与金碧辉煌的印度人教堂分布错落有致，还有殖民地时期西方人留下的荷兰街、基督教堂等夹杂其中。例如，对于国教为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庄重而圣洁的清真寺是灵魂所系与文化所载，位于马六甲的荷兰红屋是荷兰殖民者留在远东的历史最久远的建筑物，红屋旁边的“圣保罗教堂”是为了纪念被誉为东方使徒的“圣芳济”在16世纪为天主教传入东南亚作出重大贡献。

① 资料来源：《中国公民赴马来西亚须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8。

② 王琛发：《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的外族鬼神祭祀》，《人文》2001年第10期。



2.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融合

在新加坡，为进一步促进多元民族间的和谐相处，在学校、武装部队等组织集体活动、公众活动时，新加坡人一般都会共同宣读国民信约，核心内容是：“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因此，新加坡对多元文化的追求已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正如李光耀所强调的，“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力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在实践中，他们利用东方文化强调国家和社会的中心地位、注重传统伦理道德等的理念优势强化凝聚力，利用西方文化在法律秩序、行政管理、市政建设和教育等方面的优势进行社会管理。

另外，新加坡政府官方文书和新闻媒体都以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四种官方语言公布或发布，按照全国的族群比例安排租屋区和新镇的不同族群人口比例等措施，有效实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根据政府规定，在每个邻区华人不能超过 84%、马来人不能超过 22%、印度人不能超过 10%，在每栋楼房华人不能超过 87%、马来人不能超过 25%、印度人不能超过 10%。因此，由于新加坡华人与其他种族混合居住，在政府提倡不同族群要相互尊重彼此文化的背景下，马来料理、中国料理、印度料理以及娘惹料理等各族饮食被大家广泛接受。而且，华人与各种族的子女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华人与各种族人们共同欢庆彼此的节日，实现了其乐融融的融合状态。即使在家庭内部，新加坡华人对家庭成员宗教信仰的选择也相对包容与自由，呈现越来越多元化的特征，甚至出现了诸如父母亲是佛教徒而儿女们则信仰基督教等情况。

四 新马地区华侨华人推动中华文化传播的 多元共生策略

东南亚是海外华人的大本营，为了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共生状态，新马地区华侨华人孜孜以求。在历史上各个时期，无论是

“一代”还是“后裔”、“侨民”还是“公民”，新马地区都有一大批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仁人志士，他们依托广大华人社团组织、华文教育机构、华文报纸杂志、华裔家庭，积极践行多元共生策略，带领并团结广大华侨华人，在各自领域内举办活动来推介、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不仅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多元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美美与共”是新马地区华侨华人践行多元共生策略的一贯目标

文化的多元共生策略反对文化的单极化及由此产生的文化霸权。长期以来，虽然与其他族群在信仰方面并不统一，新马地区华人与当地各民族和睦相处，彼此接受与吸取对方的优秀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并没有成为相互间和谐人际关系的障碍，很好地实现了相互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在节庆即风俗习惯上努力实现彼此尊重。

例如，在吉兰丹等一些马来人聚居的地区，华人则主动“退让”。在华人中，饮酒和吃猪肉是普遍的饮食习惯，但伊斯兰教义严禁上述行为。因此，吉兰丹政府一方面严禁穆斯林饮酒，但另一方面也尊重华人的饮食习惯，未将伊斯兰教法令实行于华人，对华人的生活方式不加干涉，华人饭店可以卖酒，华人可以在饭店和家中饮酒^①。而华人为了尊重马来人的风俗习惯，从不把猪肉摆到市场上去，只在华人圈子内相互买卖。另外，尽管大部分华人对印度宗教认识不多，但在马来西亚如槟城等一些地方的华人，虽然不是信徒，他们在经过印度庙前时会稍停下脚步并合掌膜拜。

1. 独立前的殖民统治时期

在早期，作为移民的新马地区华人只是将这片土地作为暂居之所，但由于地理、气候因素以及生存需要，作为移民而来的少数族裔，华人定居后便选择与各族群杂居在一起，自身的中华文化也逐渐与当地文化融合。因此，

^① 《外州人看吉兰丹：“回教党”塑造亲民形象》，《星洲日报》2000年1月31日。



早在19世纪已有以叶亚来（1837~1885）、邱菽园（1874~1941）、陈嘉庚（1874~1961）等为代表的华人领袖带领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推动中华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例如，张弼士“初至荷属噶罗吧，见土地膏腴，最宜栽种，于是察商情，广结交，布信义，从事经营，创办裕和独货无限公司，开辟荒地，种植米谷椰子”，很快融入当地社会。到了1927年1月，《新国民日报》在“荒岛”副刊创刊声明中更是提出了“要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世界里去”的愿望。为突出强调彼此尊重与融合的重要性，1945年6月12日，李光前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的《未来的马来亚》一文，回忆了自己从小和马来西亚的小伙伴一起游玩、读书的情景，主张“所有马来人居住的地方，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婆罗洲都可以组成更大的东南亚联邦……”。

在语言方面，为了实现“美美与共”，新马地区华人提出华文课本内容也应本土化。关于教材编写，马来西亚的林连玉在1952年就主张华文教材除了必须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外，必须添加马来西亚本土的内容，他领导并参与重编华文教科书的过程中，改变之前完全由中国编纂、中国出版的格局^①。在新加坡，华文教材的编选和组织注重本土化，在教材中以宣传本国的优秀人物事迹为基础，选择了许多新加坡本国华文作者的文章。例如，为配合“社区与国家”主题，选择了描写著名华人陈嘉庚、由新加坡作家韩劳达撰写的《陈嘉庚》，为了配合“家庭为根”主题，则选择了描写母女期盼相见之情、由新加坡作家林高撰写的《等待》。

为了实现“美美与共”的目标，华人社团组织、华文教育机构、华文报刊和杂志、华裔家庭，这些不同类型的社团组织通过在各自领域内举办活动来推介、传承和发扬马华文化。其中，新马地区的华人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李光前先生呼吁新马地区华人的心态应该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而且为更好地自身生存与发展，华人还应与其他各民族亲

^① 林连玉：《改编华校教科书》，载《风雨十八年》（上集），林连玉基金会，1990，第32~33页。

仁睦邻，和谐共处，“我是喜欢并赞美马来人的，要强迫一个文化系统的人民来接受另一个文化系统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在1957年，李光前向政府承诺可以独资捐建新加坡最大的莱佛士图书馆，但附加条件之一是该图书馆必须分别购买马来文、华文、印度文撰写的各种图书，该建议得到政府当局的完全赞同，于是多种文化藏书共存的新型图书馆最终建立。

2. 独立后的新时期

自从20世纪中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后，社会的种种变迁推动新马地区华人的身份认同逐渐发生变化，由早期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到后来逐渐认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的身份，同时“华侨文化”也逐渐向“华人文化”过渡。但是，广大华侨华人在推动中华文化传播时“美美与共”的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目前，新马地区超过90%的华人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据调查，在第三代马来西亚华人中，较少人把自己当成中国侨民，一般自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①。其中，有超过80%的马来西亚籍华人学生称自己热爱马来西亚，并且愿意为她做出必要的牺牲^②。事实上，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的华人和马来人形成了事实上的共生状态，他们一起活动，阅读相同的报刊，欣赏共同的流行歌曲和电影，华人与马来人、印度人、西方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等差异不大，甚至一些文化与思维是相通的^③。相互间虽有族群间矛盾，但已基本上形成彼此忍让、相互共处的局面。从交际用语来看，马来语获得华人的重视和学习，也在华人和马来人接触的场所获得大量使用，这是华人文化适应和尊重国情的表现^④。

根据洪丽芬和林凯祺的调查问卷，马来西亚华人对马来人和印度人处事文化的适应是以尊重为主，采取不干涉但也不实践的态度；在饮食和衣着方

①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华社研究中心，2002。

② 赵海立：《政治认同解构：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③ 周福泰：《大马华人与巫人的文化交流，当代马华文存（5）》（文化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01，第220~235页。

④ 洪丽芬：《马来西亚华人与当地马来人的交往和用语选择》，《八桂侨刊》2010年第1期，第29~34页。



面，华人比较能接受马来文化，华人对自己的传统不再执着，在不受强迫、耳濡目染的情况下，表层文化自动向当地文化慢慢靠拢，已不是完整地继承和保存源自中国的文化，而是糅合了当地文化^①。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指出，新加坡华人可能也会和中国人一样，崇拜同一个关公、同一个城隍、同一个妈祖，也会到同样的孔庙去参加祭祀，可能部分人还会有很强的“乡愁”或者“乡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既然“入乡随俗”，便不再“落叶归根”，对所在国制度的认同、对久居乡土的习惯、对同样生活在他乡的亲族的依赖，更容易让异乡成故乡^②。

在1986年第三届“全国华团文化节”上，霹雳华堂主席张国林指出，“我们当然要爱护我们的文化，但同时也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希望各民族文化均能纳入国家文化的主流实现公平发展”。工委会主席黄保生也提出倡议，“我们和友族同样献出精神和力量，当然和友族有权利分享其成果，本邦华、巫、印、伊班、卡达山等民族文化汇聚下，更能反映多元文化特征……”^③。与此同时，马中友好协会前主席乌士曼阿旺认为：“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以及大马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加强，非华人如马来人都需要学习及了解中国历史。”^④

在舞蹈方面，华族舞蹈不仅是中华舞蹈文化的继承者，还是外族舞蹈文化的接受者。华族舞蹈具有鲜明的马来西亚时代特色，在多元融合的氛围中获得了继承和发展。著名华人华族舞蹈家、马来西亚“舞蹈薪传奖”获得者刘其信说：“我们的民族舞蹈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是因为我们不仅教学生跳华族舞蹈，而且也教学生跳马来亚舞、印度舞、芭蕾舞。”^⑤

① 洪丽芬、林凯祺：《马来西亚华人对马来和印度生活文化的适应》，《八桂侨刊》2015年第1期，第10~18页。

② 葛兆光：《中心与边缘、分歧与认同、离散与聚合——东亚文明互动与传播的历史样态》，《北京日报》2016年7月18日，第15版。

③ 黄文斌：《华人与国家文化建设：以全国华团文化节为例研究》，《华社研究中心论文集》，2007。

④ 引自：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4年11月8日。

⑤ 黄明珠：《多元交融中的马来西亚华族舞蹈》，载《欣赏与评鉴》，2002，第30~31页。



（二）利用华文教育，强化传播主体文化自觉意识

在新马地区语境下，新马地区华人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根，而华文就是“根”的象征，华文学校则被视为维护母语教育的堡垒^①。正如洛佩兹（Lopez）所说，马来西亚的华人和印度人都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学校，因为他们与马来人一样坚信“语言是民族的灵魂”^②，是强化传播主体文化自觉意识的根基和基础。长期以来，为使子孙延续和发展中华文化，新马地区华人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华文教育提供了巨大支持，其中既有慷慨解囊的如陈六使等富商，也有捐出血汗钱的三轮车夫等体力劳动者。

目前，无论是在现代化都市，还是在偏远的乡村，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华文的招牌、听到华语的声音，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新马地区华人长期以来对华文教育的坚守与执着。虽然新马地区的很多华人乡音已不再纯正，甚至不再记得宗祠，族谱也因各种原因被毁掉，但他们依然在支持着华文独立小学、中学，他们说：“因为这里是马来西亚，所以更要把根留住。”马来西亚也成为除中国大陆、台湾、港澳地区以外唯一拥有小学、中学、大专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华文教育系统保持得非常完善，这与马来西亚华人100多年来对华文教育的坚守与执着分不开。

1. 独立前的殖民统治时期

新马地区的华文教育可追溯到18世纪中叶，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放任华文教育自生自灭。1893年，薛福成（1838~1894）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槟榔屿城建屿之东北，英人名卓耳治城。……英设义学四十二所，教华文者一，教英文者五，教巫来由者三十二。”^③1886年，邹代钧（1854~1908）访问新加坡时也有类似看法：“华人居此者……其衣冠语言、礼仪风

① Collins. A. , “Chinese Educationalists in Malaysia: Defenders of Chinese Identity”, *Asian Survey*, 2006, 46 (2): 298-318.

② Lopez. C. C. , “Language is the Soul of the N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Identity, and National Unity in Malaysia”,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2014, 13 (3): 217-223.

③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收于钟叔河编《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第9卷，岳麓书社，1985，第874页。



俗，尚守华制，惜文教未兴，子弟之聪俊者皆入西塾，通西文，圣经贤传竟不与目。”

当时，新马地区华人就已经开始重视华文教育，1889年出版的《叻报》指出：“今日之英文，固为时尚，有志者实不可以不学，然身为华人，则当为之兼习中西文字，固不宜徒习西文也。”^① 1897年，林文庆在《海峡华人杂志》上发表社论：“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不同特性，主要在于生活上的三个方面，就是文化、宗教与语言。如果这个民族中的任何成员失去了这个特性，他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特征。单纯接受英语教育的华人就会迅速走向‘民族离心化’”。

新加坡首任领事左秉隆任职期间（1881~1891）积极倡办私塾学校，大力支持王会议、童梅生等人创办的诗社“会吟社”。清政府派驻新加坡的首位总领事黄遵宪于1891年上任后，继续为会吟社每月举行的征联比赛出题，还取用庄子《逍遥游》中“鹏之徙于南冥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而后乃今将图南”之意，将左秉隆创设的会贤社改名为“图南社”，以加强海外华人对中国的认同及效忠意识。图南社的影响甚至远及中国：“其拔取前茅者，粤之中西报，上海之沪报，辗转钞刻，互相传诵，南离文明，于兹益信。”左秉隆和黄遵宪都是前期有文化使命感的官员，其中《叻报》对左秉隆掌管新加坡时作了这样的报道：“叻中书塾，除自请儒师以及自设讲帐者外，其余义塾，多至不可胜言。”^② 黄遵宪任满之时，《星报》这样形容他：“莅任以来，筹赈灾黎，振兴文学，保护华民。”^③

接下来，张弼士于1904年创办了马来亚第一家华文学校檳榔嶼中华学校、陆佑在吉隆坡创办了第二家尊孔华文学校、吴雪花女士1908年在吉隆坡创办了第三家华文坤成女校。李光前先生深知：“要在新马社会中

① 《叻报》1889年1月19日，引自陈育崧《椰阴馆文存》第2卷，南洋学会，1984，第227页。

② 《叻报》1890年3月13日，引自陈育崧《椰阴馆文存》第1卷，南洋学会，1984，第123页。

③ 《星报》1895年3月11日，转引自叶钟铃、黄遵宪与图南社，《亚洲文化》1991年第15期，第121~127页。

倡导多元文化共存的思想观念，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从教育入手，在新马社会的一代新人中从小播下教育平等、种族和谐的幼苗。”因此，他一方面反对当局对华文教育的限制，一方面为发展华文教育和文化设施全力以赴，积极奋斗，在东南亚的捐资助学中多次强调种族平等、多元文化共存的思想。

2. 独立后的新时期

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虽然绝大多数华人都加入了马来西亚国籍，从以前认同中国转为认同马来西亚，但对华文教育的支持一直延续到今天。华文小学也一直是华裔家长的首选学校，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统计，2010年有93%的华裔报读华文小学，对培养华裔的文化自觉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项成果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源于新马地区华人爱护华教的愿景，为华教在本地区发扬光大而持续努力。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长林玉唐先生说：“现在全球兴起汉语热，在马来西亚，我们华人社团一直在为华语教育努力。”马来西亚侨领陈国庆说：“在逆境中自强不息，是马来华人的精神。一点点去做，一步步去做，为的就是让新生代华裔认识自己的文化。”例如，在马来西亚扬名国际的马六甲鸡场街，分布着福建会馆、雷州会馆、海南会馆、茶阳会馆以及潮州会馆等知名会馆。在新时期，它们在继续联系乡谊的同时，逐渐把支持和推动华文教育发展、传承中华文化视为重要的社团功能^①。

在支持华文教育的过程中，独立以来的新马地区涌现了一大批杰出侨领，他们团结华侨华人，依托华社组织支撑着庞大的华文教育体系。例如，杨忠礼先生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塞班王”陈守仁在东南亚等地捐建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华文学校及会馆，支持菲律宾、关岛、塞班及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华文教育。新加坡的陈江和先生多年

^① 李世康、许明阳：《马来西亚地缘性百年侨团的当代角色与功能》，载吕伟雄《海外华人社会新视野》，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第199页。



来为推动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支持海外华文教育培训及派遣华文教师志愿者项目，还采购了中国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知识手册和思想品德教育等中文教材，带到旗下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探索以更有效的教学方式推动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人古润金深切体会到推广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多次向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捐资，截止到2017年5月，古润金所领导的完美公司共捐款7500万元人民币支持华文教育。

（三）积极培育中华文化的多元共生载体

长期以来，新马地区华人以中华传统文化与习俗为共生载体，通过对舞龙舞狮、赛龙船等传统活动的坚持和发展，以及对祖先的祭祀、对神灵的供奉等途径，努力在当地实现中华文化“从播到生”，使其他族群的人们逐渐认识、接受和欣赏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已经不会讲汉语、不认识华文的马来西亚土生华人“峇峇”，即使已经改信其他宗教，却依然保留祭祖等中国的传统节日习俗^①。具体来讲，这些载体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中华传统节日及仪式。新马地区华人为了让后代子孙牢记自身的文化根基，他们非常重视中国传统节日的庆典仪式，如春节、清明节、冬至、端午节、中秋节等仍然是最为重视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尤其隆重。节日期间的文艺节目演出、武术表演、猜灯谜、中华传统画展、中华传统服装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特色，也吸引了其他族群的广泛关注。研究表明，在马六甲与槟城，在重要节日，华人借由义冢的祭祀传统，凝聚社会认同，重建伦理纲常与传承文化意识，是当地华人得以在海外重构华人世界与延续华夏传统的载体之一^②。

第二，传统民俗。新马地区华人的婚礼和葬礼仪式是展示华人风俗的重要窗口。对于婚礼，新马地区广东广宁籍华人在结婚当天，男家要挑礼物到

① 刘文丰：《推广华族文化纳入国家主流》，载《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华侨华人报刊资料剪辑》1997年第5期，第71页。

② 马来西亚东西方生死学研究基金会：《从墓园祭祀延续儒家“仁”道教化——兼谈马来西亚华人殡葬的礼仪传承》，《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7年第2期，第47~64页。



女家“过礼”，结婚当天或第二天，新郎和新娘要到女家“做郎”（又称“回门”），如此婚嫁习俗几乎与当下广东广宁乡下婚嫁传统仪式一个模样。另外，在华人的出殡仪式中，仍然保留着许多中国古老的形式，如采用三牲献祭、沿途分发银宝、道士念经开路、家族成员作为孝男孝女披麻戴孝，而且扶框号哭等。直到今天，新马华人通过报纸登载讣告“昭告天下”丧事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丧葬文化。

第三，饮食文化。广大华人在新马地区生根繁衍后，由于气候环境和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差异，他们在口味、原材料选取、烹饪方法、饮食习惯等方面悄然发生改变，他们努力推进与当地饮食文化的融合，既保留家乡的传统特色，又积极与当地风格结合，形成了新马地区特有的饮食，如“肉骨茶”“鱼生”“海南鸡饭”及多种糕饼等，这种融合既丰富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形态，也使其更容易被当地民众所接受。在马来西亚诗巫每年举行的婆罗洲文化节上，新马地区华人也会积极推介中华传统美食，让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人感受和了解基于中华传统的饮食文化。

第四，艺术文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马地区对中华文化富有使命感的华人团体纷纷创建各种协会，将中华传统艺术作为文化共生的载体。例如，舞蹈表演艺术创造了高桩舞狮和二十四节令鼓，其中“高桩舞狮国际比赛”被马来西亚政府于2007年正式列为国家文化遗产，二十四节令鼓则提升了中华传统鼓文化的欣赏价值和在新马地区的地位。正如二十四节令鼓创始人之一陈再藩所说：“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二十四节令鼓就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继承和创造。”^①潮州会馆醒狮团自1976年以来便在马来西亚国内外参与武术比赛且获奖无数，时常受邀到各地演出助兴^②。

① 《大马华裔二十四节令鼓创始人：用现代方式传承文化》，新华网，2012年12月4日。

② （马来西亚）林秀美、祝家丰：《马来西亚马六甲鸡场街华人地缘性组织初探》，《八桂侨刊》2018年第3期，第3~13页。



（四）充分利用沟通与斗争的实现手段

在新马地区，文化的多元化意味着差异与冲突共存，而取与让一直是新马地区族群政治的特色。长期以来，沟通与斗争一直是新马地区华人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的两种重要手段。

1. 沟通

沟通一直是新马地区华人争取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早在 19 世纪末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就开始在新马地区植根并兴盛流传，由华人领袖领导的民间性文化再生运动，是一种根的失落与追寻的历程。为加强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当地有影响力的华人通过新闻媒体为中华文化在新马地区的合法传播争取社会支持。例如，1946 年，李光前先生在陈述民族和文化的系统观点时说，“华侨居住在殖民地，如果硬叫他们放弃中华文化传统，那么请问他们去接受什么？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作马来亚本体文化的？是不是英文学校所施行教育就可称为一种本体文化呢？好多反科学、反常识的设施，如果按照科学的眼光来看，是会令人莫名其妙的”^①。

从沟通媒介来看，从 1881 年薛有礼出资创办《叻报》以来，华文报业一直是早期新马地区华人进行沟通的主要渠道。早期的华族领袖如林文庆和邱菽园等除了发表演讲外，更主要的就是通过《海峡华人杂志》（1897 ~ 1907）、《天南新报》（1898 ~ 1905）和《日新报》（1899 ~ 1901）等报纸杂志评介有关中华文化的英文著作，如《中国历史》《中国名人辞典》《中国瓷器》《中国评论》《当代评论》《帝国之路》《中国贸易的方式和策略》《中国历史概要》《中国内部》等，以此为中华文化传播争取社会支持。

从独立到中马建交前（1970 ~ 1974），马来西亚华人在中马文化互动沟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在冷战期间中马无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李引桐与新上任的敦拉萨达成共识，于 1971 年以个人身份请求中国红十字会向吉隆坡水灾捐款，使得中国政府最终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马来西亚灾区提

^① 引自《星洲日报》1946 年 10 月 20 日。

供 50 万元人民币捐款^①，中方伸出的友谊之手对马来西亚政府产生了较大影响^②。接下来，由李引桐开拓的社会文化互动在 1970 年至 1974 年频繁展开，有效拉近了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1993 年 6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李引桐先生“共和国一等功臣”的称号。在捍卫华文教育权利的过程中，马华公会的领袖主张采取沟通协商的方式与巫统处理族群权益。在他们看来，任何提案都应以国家的稳定为前提，各民族的和谐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永远为所欲为”^③。

进入新时期以来，新马地区华人仍在积极推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2008 年马来西亚华社首位“国家文化人物”奖获得者陈徽崇、马来西亚紫藤茶艺创办人林福南，还有享誉国际的著名书画家、马来西亚“现代艺术教育之父”钟正山等，都在为中华文化的对外沟通奉献自己的力量。另外，在当地华人的支持下，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举办了“2014 中国·马来西亚伊斯兰文化交流会暨中国伊斯兰文化展”，主题为“传承丝路情谊，共创美好未来”。马来西亚华人古润金为让更多的马来西亚人了解、喜爱中华文化，于 2016 年主导主办了“时间的船——2016 马中文化交流艺术盛典”，并助力在马来西亚举办以“文化中国·四海同春”为主题的海外春晚^④。

2. 斗争

说华语是定义华人的关键因素之一，语言是华人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⑤。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从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强烈主张将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同时列为马来西亚的国语。但是，马来西亚有关的教育

-
- ① 钟启章：《马中建交功臣李引桐传奇，第一篇：巧媳作红娘重系马中情》，《南洋商报》1997 年 8 月 18 日。
 - ② 郑荣江：《马中建交 25 周年（1974～1999）：大马首个东合国与中国建交》，《星洲日报》1999 年 5 月 31 日。
 - ③ 引自陈修信《如被认为是华人团结的障碍，我准备随时隐退——敦陈修信演说词》，收录于《石在火不灭：沈慕羽资料汇编（2）》，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1996，第 196 页。
 - ④ 《马来西亚侨商古润金：民心相通“润物细无声”》，中国新闻网，2017 年 5 月 16 日。
 - ⑤ Wong, Z. - H. K., Tan Y. - Y., “Being Chinese in a Global Context: 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of Chinese Ethnicity”, *Global Chinese*, 2017, 3 (1): 1 - 23.



政策与以前的一脉相承，明显向马来文至上的单元政策发展。1970年，马哈蒂尔在撰写的《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中虽然批评了马来人的懒散、缺乏进取精神等，同时又坚决捍卫马来人作为土著居民的特权，提出“只有马来人才是马来西亚的合法主人，外来移民是客人，只有当外来客人放弃他们过去的语言和文化，讲马来语，被当地融合吸收，才能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1971年举行的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大会甚至提出，在建设国家文化时要遵循“国家文化应以土著文化为核心”的原则，实质上是对华人文化、印度人文化等非土著文化的排斥。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人为争取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传播的权利，在以董教总为首的华社领导下，一大批华人团体和华人精英为争取本民族的权益进行积极抗争。1987年的华小高职事件把华教运动推向高潮，各种华教团体、华人政党、华文报刊都积极参与其中，热情和力度空前，并取得一定成效，这是今天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能与马来文化共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斗争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捍卫华文教育的华人，如被誉为“族魂”的林连玉、“族英”的沈慕羽以及陆庭谕等，这些华文教育斗士领导整个华社与当局展开历时数十载的斗争，他们的思想理念、个人修养、斗争立场及领导风格对华文教育在海外推广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林连玉据理力争，在为华文教育争取权利的过程中绝不妥协，最后甚至导致其公民权被掠夺，教师证也被吊销。而对于沈慕羽而言，则是用“服务一生，战斗一世”的无私奉献理念来引领他实现争取华文教育权利的理想，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讲道：“我是一介布衣，没有很高的学历，没有官禄，没有雄厚的资产，受到推崇，真是受宠若惊，其实我是一个华文教育的苦行僧！”他所留下的“华文教育尚未平等，同道仍须努力”激励着新马地区一代又一代的华侨华人争取华文教育的权利！

林晃生还认为，“华社提出多元文化要求，旨在行使民主权利”，而“这个民主的基本权利就是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①。他们在谈及基本民族

^① 林水椽：《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历史与人物（儒商篇）》，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3，第354~355页。

母语教育与文化权益时提出，必须秉承“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政治立场”，“……为了华教与民族的利益，我们介入了大选，如今大选已过，我们将尽量保持本身的独立性，避免卷入党争的旋涡，以便更广泛地团结各党各派的人士，继续扮演民间压力集团的角色，为华教及民族权益做出更大的贡献”^①。

（五）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改善多元共生环境

长期以来，为了给多元文化共生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新马地区华人努力实现与各族人和谐相处，共同肩负起建设新马地区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主义不愿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帝国主义的冷战政策和反共浪潮影响巨大，李光前先生审时度势，认为在这种情势下“华侨意识”已不合时宜，提出多元文化共存的主张，并强调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他一再向华人社会呼吁：“希望侨居在南洋的华侨，一心一意地参加当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建设工作，谋求地方事业之发展，增进人类福利。”^②

新马地区华人除了在经济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以外，还积极践行“仁义”“向善”的中华核心价值观念，通过捐款、社会服务以及建立学校、庙宇、会馆、医院等形式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推动当地公益事业的主要力量，这也是其他族群感知华人形象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早期的新加坡，在当地政府和民众出现困难时，有许多华人领袖会挺身而出，被后世景仰者奉为“先贤”，如早期的陈笃生、余有进、胡亚基，较后期的有金声、余连城、陈若锦、章芳琳、颜永成，20世纪以来的陈嘉庚、胡文虎、李光前、高德根、陈六使等，他们在扶贫济困、兴学办校等不同领域都作出过积极贡献。2019年6月，为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的20元新纪念钞上，正面是新加坡首任总统尤索夫·伊沙克（Yusof Ishak）的肖像，背面则印着19世纪初到新加坡的8位先驱人物，其中著名

① 引自《对介人大选及今后动向的声明》，《董总卅年》中册，第430~431页。

② 见《星洲日报》1946年10月20日。



华人领袖陈嘉庚赫然在列，成为出现在新加坡钞票上的首位华侨面孔。

著名侨领李光前向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提供了巨额款项，他资助过的学校遍布新马地区，如南洋大学、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拉曼学院等 20 余所，于 1952 年设立的李氏基金捐赠成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自然博物馆、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医学院、新加坡图书馆的李光前参考图书馆、南洋艺术学院的李氏基金礼堂等，都是对华人领袖的最好缅怀。1992 年，李光前之子李成义获得新加坡总统授予的“公共服务星章”，1993 年又获得新加坡国家福利理事会授予的最高荣誉奖“余炳亮”奖。

在马来西亚，华人会在春节期间践行公益活动，包括推进华语教育、救助弱势群体以及赈灾等，这些公益活动可以提升其他民族对中国的好感度，让华人春节更容易被他们认可和接受^①。另外，很多华人领袖的慈善活动改善了华人的形象，如杨忠礼为发展繁荣马来西亚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作出了贡献，在 1983 年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苏丹殿下颁赐拿督勋衔，1996 年晋封拿督斯里勋衔，1985 年最高元首颁赐丹斯里勋衔。著名华人领袖林梧桐在各个工业领域为马来西亚经济贡献良多，马来西亚执政联盟国民阵线的华人执政伙伴黄家定认为：“林梧桐将荒山野岭开发成为旅游胜地，同时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林梧桐是大企业家，走过的路和贡献值得马国人民，尤其是华族引以为荣，感谢林梧桐对慈善和教育所作的重大贡献。”

因此，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华人新移民群体族群意识的提升，使得海外华人更关注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形象，他们甚至呼吁和鞭策自我素质形象的提升，以此作为途径优化“中华形象”^②。

五 未来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

① 陈佳杰：《马来西亚华人春节习俗研究——以武拉必新村为个案》，拉曼大学，2017。

② 曾筱霞、冰凌：《中华认同与中华形象》，中国新闻网，2011 年 9 月 16 日。

放体系，促进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必然选择，对于我国的国际形象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文所述，在几代人的努力下，新马地区华人利用多元共生策略在中华文化传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

目前，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基于政治目的、现实利益和文化冲突的考虑，部分西方舆论仍然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进行抹黑。另外，随着社会的变迁，新马地区华人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度逐渐减弱，华社组织的“会馆老人院”现象比较严重。在此背景下，如何利用多元共生战略提升中华文化在新马地区的传播效果，未来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客观看待新马地区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变迁。从侨民到公民，马来西亚华人所经历的文化适应还在继续。虽然客居心态已经完全消失，华人也接受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并未全盘接受和融入当地的文化，也未抛弃中华文化。因此，社会变迁对华人文化认同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改变是必然的，我们提倡积极构建海外华人华侨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并非要一味强化他们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更不是以此为理由削弱其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而是希望海外华人华裔不要抛弃其固有的华人身份和对中华文化应有的情感，平衡好所在国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关系，从而成为增进中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①。

第二，进一步扩大共生载体的影响力。根据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课题组的分析结果，对于华裔而言，书法、功夫、旗袍与长城是最受认可的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但是他们的熟悉程度远远低于他们的认可度^②。新马地区华人可以扩大中医药、武术、美食、节日民俗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代表性项目的国际影响力，打造一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标志性人文交流品

① 丁和根：《海外华语传播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新闻界》2017年第9期，第76页。

② 陈奕平、宋敏锋：《关于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形象的问卷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第64~74页。



牌，用华裔、“峇峇”和当地土著等听得懂和喜欢听的语言，讲好中华文化的品牌故事，增进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熟悉程度。

第三，要善于吸纳和运用新思想、新方法。文化实质上是社会信息交流的过程，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和积累起来的，因此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方法需要广泛借鉴吸收多个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养分^①。随着移动互联传播技术的出现与普及，当前文化交流的范围、强度、速度和多元化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规模。因此，海外华人要创新传播方法和理念：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传播手段，深入挖掘各种舆论工具的影响效果，继续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的实践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资源，不仅构建了国家和民族的“信仰体系”，还具有相应的经济价值。因此，新马地区华人在推动中华文化传播时，还可以借助中华文化中心的平台尝试打造海外中华文化综合体，针对当地生活习惯，推出相应的文化产品。

第四，要克服“重传统、轻当代”倾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是伟大的文化创造，充分吸引了海外民众的目光。新马地区华人未来在推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过程中有助于树立文化自信，摒弃文化自卑感，在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同时，更要加强当代中华文化传播，在新马地区华人和热爱中华文化的国际友人中塑造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自觉。

第五，要重视与国内官方和民间团体的合作。近几年，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民心相通”，我国官方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进行了顶层设计，全方位的文化政策和方向性的措施指引，建立了许多跨境文化交流平台，并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和物力支持。新马地区华人和社团组织可以通过官方、媒体、智库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在当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合作，拓宽国际文化产业合作领域。

^① 张恒军、曹波：《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应形成三方面共识 提高文化走出去的能力》，《人民日报》2018年5月9日。

参考文献

Sarah. K, Jonathan. M, Ruth S. C. , “ Symbiont Practices Spanning: Bridging the Cognitive and Political Divide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 2017, 60 (4).

Wang Ning, “ Dentity Seeking and Constructing Chinese Critical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 2011, 30 (3).

Cohen. G. L. , “ Party over Policy: The Dominating Impact of Group Influence on Political Beliefs”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2003, 85.

Fredrik Barth, “ Introduction” , in Fredrik Barth (eds.) ,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 Norway: Universitets forlaget, 1969.

Collins. A. , “ Chinese Educationalists in Malaysia: Defenders of Chinese Identity” , *Asian Survey* , 2006, 46 (2).

Lopez. C. C. , “ Language is the Soul of the N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Identity, and National Unity in Malaysia” ,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 2014, 13 (3).

Wong. Z. - H. K. , Tan Y. - Y. , “ Being Chinese in a Global Context: Linguistic Constructions of Chinese Ethnicity” , *Global Chinese* , 2017, 3 (1).

林水椽:《创业与护根:马来西亚历史与人物》(儒商篇),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3。

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华社研究中心,2002。

黄文斌:《华人与国家文化建设:以全国华团文化节为例研究》,《华社研究中心论文集》,2007。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收于钟叔河编《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第9卷。

李世康、许明阳:《马来西亚地缘性百年侨团的当代角色与功能》,载吕伟雄《海外华人社会新视野》,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邹广文:《全球化进程中的哲学主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4卷),群言出版社,1999。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

林秀美、祝家丰:《马来西亚马六甲鸡场街华人地缘性组织初探》,《八桂侨刊》2018年第3期。

陈修信:《如被认为是华人团结的障碍,我准备随时隐退——敦陈修信演词》,收录



于《石在火不灭：沈慕羽资料汇编（2）》，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1996。

陈奕平、宋敏锋：《关于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形象的问卷调查分析》，《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4期。

徐德峰：《跨东西方文化的学术对话和理论建构——读〈多元共生的时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马海龙：《身份认同、社会资本与商业拓展——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商人个案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易佑斌：《多元共生：建构中的东亚共同体理念》，《岱宗学刊》2005年第4期。

曹云华：《变异和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伍柳氏：《和而不同 多元共生——略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化发展策略抉择》，《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赵海立：《政治认同解构：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吴旻：《“多元共生”文化理想下的中西思想对话——以弗朗索瓦·于连的汉学研究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

郑一省、叶英：《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共生态势初探》，《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吴旻：《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例外”与文化复兴》，《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方光华、曹振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自觉”思潮论析》，《人文杂志》2011年第9期。

胡春艳：《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华人权益争取：以政治社会学为视角》，《八桂侨刊》2014年第4期。

丁龙召：《认识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新视角：各民族共生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

蒋炳庆：《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和谐实现——基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观察》，《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8期。

王琛发：《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的外族鬼神祭祀》，《人文》2001年第10期。

洪丽芬：《马来西亚华人与当地马来人的交往和用语选择》，《八桂侨刊》2010年第1期。

洪丽芬、林凯祺：《马来西亚华人对马来和印度生活文化的适应》，《八桂侨刊》2015年第1期。

文平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传承与创新》，《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7期。

袁年兴：《民族多元共生的基本逻辑：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陈肖英：《信任与海外华商族群网络研究——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金虎雄：《全球化与多元共生时代的文化发展战略》，《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王宁：《林文庆在新加坡的早期报刊活动及其思想透视》，《八桂侨刊》2006年第4期。

周聿峨、胡春艳：《浅析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下的华人文化——兼论多元文化的建设》，《世界民族》2008年第5期。

李天锡：《试述多元文化对李光前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八桂侨刊》2008年第1期。

洪彩真：《李光前先生“多元文化共存”思想探究》，《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赵虹：《新加坡多元文化的成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